

#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李学勤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出土文物;《周易》;孔子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2-0005-05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第二个问题讨论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分四点,一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二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四是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 一、为什么要用考古的材料来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为十三经居首的一部经书。本文这个题目与我近些年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用今天考古的资料来论证《周易》,特别是《周易》和孔子的关系。孔子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像传统记载那样,孔子与《周易》等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六经是自己形成的,有些经的形成甚至是很晚的。

究竟《周易》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世界文化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要,究竟为什么?这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去研究孔子?用哪些材料来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依据《论语》,

但是否只有《论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研究孔子主要是六经(或“五经”),六经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注释,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贡献。如果否定六经与孔子的这种关系,孔子的形象肯定完全改变。

今天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是想论证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是一个圣人。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孔子有他的时代,是他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就代表了孔子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孔子那个时代文化、学术的认识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周易》,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就是否定了孔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如果确定孔子与《周易》确实有关系,那么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哲学是相当辉煌的,已经有像《周易》经传这样的哲学体系了。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大家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的学者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今天我们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怎样释古?仅仅靠古书是不行的,更要注重利

收稿日期:2004-01-20

作者简介:李学勤(1933—),男,北京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用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分为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就是指竹简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保存了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古书原貌。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与《周易》有关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是古代经典里最难懂的,也是古代经典中注释最多的。吉林大学几位学者编了一部《周易辞典》,其中所收的《周易》著作的目录提要,要读一遍也得几个月吧,这其中还不包括古代有而现在已经佚失的。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列易学书籍已经是洋洋大观。而且,不止中国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现代的、西方的等等。可是,所有这些著作,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研究《周易》所用的材料都用的是传世本。即使是传世本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早在汉代,《周易》已有今古文之别。因此,我们都希望在考古发现中找到更早的《周易》的本子,比传世本更有根据的本子,这在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

## 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是在1973年。很多人记得马王堆一号墓女尸的发现,这具女尸是汉初长沙丞相夫人辛追,当时轰动一时。二号墓基本被盗空,大家关注的就是随后三号墓的发掘,当时都希望再发现一具古尸。结果,在对三号墓的发掘中,发现了漆盒中的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有《周易》。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周易》本子。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是书写精良的两卷帛书,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2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抄写的时间应比下葬时间要早,而《周易》又是马王堆帛书中抄写时间最晚的,因此我们说是汉文帝前期的本子。帛书《周易》有经有传,但与传世本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的经文和传文。

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是乾、坤、屯、蒙……既济、未济,而帛书《周易》经文是始乾终益,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周易》本子。经过释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这并不奇怪,但为什么卦序不同呢?很容易想到的是传世本是经过改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是《周易》的原来的卦序。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同一帛书《易传》中显示的卦序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是更古的,《易传》的卦序不应是

传世本的卦序。如果由古的卦序变成传世本卦序,帛书就不应该保留古的卦序。

我们的意见是,帛书经文的卦序是后来改编的,传世本卦序反而是更古的。一般来讲,先有比较乱的次序,而后才有比较有规律的次序,改编后的应更合乎逻辑的。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根据当时发掘简报刊出的帛书前几卦的照片,便推出了六十四卦的卦序,和经文的卦序完全一致。因为,帛书经文的卦序的排列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它用的是“分宫法”,分八个宫,把六十四卦规则的排列起来,而传世本的卦序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工作,迄今为止有两个最好的推导方法,一个是已故的沈有鼎先生的推法,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的推法。虽然也能推导出来,但用的方法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

关于分宫法,过去认为很晚才出现,实际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了,这证明至少在汉代前期已经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分宫理论。因为我们知道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帛书《周易》的下葬是在汉文帝前期,那么,本子的形成和分宫法的出现可能更早,因为在“挟书律”废除以后的时间太短,在“挟书律”实行期间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宫的方法是和今本《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认为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是按《说卦》把六十四卦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便是易学。由于其中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因而作这个卦序的人是一个易学家,他用阴阳思想重新组织、改造了原来的卦序。

下面再说传文。传文共六篇。大家知道传世本《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帛书《易传》不是这样,它的六篇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

1、《二三子问》这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学生的问答,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本。

2、《系辞》文字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和今本相同,但只包括今本《系辞》上和《系辞》下的一部分。其中的“子曰”部分应是孔子的话,也可能有弟子的发挥。这是《易传》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部分。

3、《衷》主要包括今本《系辞》下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系辞》中所没有的。

4、《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相符,证实了孔子和《周易》的密切关系。

5、《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和穆和等很多人向“子”问《易》。在这两篇中，“子”有时又称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应是传《易》的经师。显然，越向前排列的越和孔子接近，到后面变成了传《易》的经师，因而这六篇是按内容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说帛书《系辞》比今本《系辞》早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今本《系辞》中是整段的，有的在帛书本中被割裂为两段，甚至一句被割裂为两句，文句不通。这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是，秦火之后，编订的学者得到的《系辞》已经散乱，重新编排时没有联接好，把一些简编错，因而今本《系辞》实际更早。另外，今本《系辞》有一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帛书本中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是当时脱失了。

总之，编订马王堆帛书的易学家在当时不仅搜集、流传了《易经》，也流传了一些与《易经》有关的传文。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现在我们见到的帛书中楚国《易传》，与今本相比，不只是文字本身不同，而且思想、学术不同，因为南方的本子不仅经文分宫，而且还有几个地方有数术，如讲“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用数术，当时南方有数术是不希奇的。《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实际上，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这就是帛书本所体现的。

### 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在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汉代竹简《周易》。一号墓是汝阴侯夏侯婴的墓。夏侯婴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婴的卒年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5年，即公元前165年。这个时间和马王堆墓葬的下葬时间只差了三年，可以说几乎同时。这座墓在古代曾经有过塌方，竹简在竹筒里，因而被压扁了，像压缩饼干，拿出来放水里，像黑乎乎的树皮。送到北京，经保护整理，发现里面有《仓颉篇》、《诗经》和《周易》。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开始报道说，有300多个字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可以看到有完整的卦画卦辞的有九片，有完整的爻辞的有六十多片。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全部材料已经发表。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

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先生所补《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瘳。”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贱、贫富、君子小人等。我们可以看出，卜事之辞给出的判断是与卦爻辞有关系的，如：《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告”在出土文献中作“吉”，应该是“吉”。卜事之辞说：“有求者，得，不喜；罪人，不吉。”为什么呢？这是从卦辞里来的。你初筮本来是吉的，结果你老麻烦神，神说不吉啦！可见判断和卦辞本身是直接联系的。再如《否》卦爻辞“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卜事之辞说：“以卜大人不吉，小人吉。”这等于是照抄《否》卦爻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两部《周易》，一部在《六艺略》，一部在《数术略》。阜阳简的这种《周易》不属于易学，这种卜筮也是很浅显的。所谓易学是从一种哲学高度，从阴阳学说分析卦象，得出哲学的认识、人生的道理，所以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孔子跟他弟子强调研习《周易》不是为了占卜，而是为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哲学学术研究。像上面谈到的是否就是《周易》的原貌呢？不是，阜阳简的《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退化了的，从其中的职官来分析，不会早过战国晚期。从易象研究《周易》，研究其中的哲学道理，至少从春秋就开始了，《左传》、《国语》里很多例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易学已经开始萌芽。

###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上海博物馆1994年由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总的说来，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300—前278年之间。竹简中有《周易》，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周易》最早的本子，但也是只有经文，没有传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简本《周易》各卦都有彩色

的符号,这种符号的用途不完全清楚,但经学者研究,如果依照传世本卦序,符号的分布便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证明简本的卦序就是传世本一样的卦序。有兴趣的,请看《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姜广辉先生的《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

这个简本在校勘上有很大意义。其间确有比传世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本优胜的地方。比如帛书本有一些错误,与简本比照,就可知道致误的原因。例如《大畜》九五,今传本“豮豕之牙”,首字简本作“芬”,是音近通假,帛书本作“哭”,过去无法理解,现在知道是“芬”的形讹。

简本还证明帛书本有些地方胜于今传本,如《随》上六,简本“从乃嘴之”,帛书本第三字作“鷩”,只是把上半字写错,而今传本作“维”,估计是字的残脱。

但是有些地方,简本不如帛书本,如《颐》初九今传本“观我朵颐”,“朵”字帛书本从“手”“短”声,古音对转,合于情理,简本作“敬”,就不对了。“敬”其实是错字,应从“耑”声才对。简本的错字还有不少,如《讼》九二“三百户”,简本竟把“百”错为“四”字。另外,若干地方还不如今传本。

这些表明,不管是上博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双古堆汉简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 五、湖北省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大家知道,古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还有人见过《连山》、《归藏》。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可是《汉书·艺文志》对此未载。后代虽有著录,但皆被疑为伪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辑本。

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竹简。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的秦墓。这批竹简经过学者的研究整理,被认为是《归藏》。

对照这个竹简本《归藏》和《周易》、辑本《归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年代和它与《周易》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卦画相同,但卦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的。比如,《周易》的《谦》卦,《归藏》作“陵”,“谦”与“陵”不管音与义都是没有关系的;《周

易》的《家人》卦,《归藏》作“散”,“家人”与“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归藏》有些卦名是和《周易》不一样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卦名虽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坎》卦,《归藏》作“劳”。辑本“劳”写作“萃”,“萃”是“劳”的假借。“坎”和“劳”字本身好象是没有关系,但《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坎”就是“劳”。现在我们看到,《归藏》“坎”就叫“劳”。为什么呢?《说卦》有解释:“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个解释完全是从《周易》来解释的,不是从《归藏》解释的。所以《归藏》把“坎”做“劳”,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今天见到的《归藏》不仅晚于《周易》,而且是从《周易》来的,是从易学来的,是从《说卦》来的。这绝对不是《说卦》抄《归藏》,因为如果《说卦》抄《归藏》,一定按《归藏》上讲,而《归藏》有一个特点,坤卦是首卦。因而,《归藏》是从《周易》而且是从《易传》来的,出现还是比较晚的。《归藏》的时代性可以从此看出来。还有一种,《归藏》的卦名是从《周易》联想来的。《鼎》卦,《归藏》做“薰”。“薰”是小鼎,这是连类而及。

第二种是文字形体不同,但还是同一个字。比如,《坤》,在《归藏》作“𡗗”,其实这还是“坤”字,汉碑里有此写法。从大,申声。又如《周易》的《明夷》卦,辑本《归藏》做“明𡗗”,“𡗗”是“夷”字古文。

第三种就是通假字。《周易》的《需》,《归藏》作“𡗗”,《剥》卦作“𡗗”。有的通假不太容易想到。比如,《蛊》卦,《归藏》作“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蛊”在《后汉书》里通作“冶”,“夜”与“冶”又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汉代,常用通假字。又比如,夬,《归藏》作“𡗗”,其实是“夬”。在古音中都是见母月部,是同音字。

还有的就是增字。《家人》卦,在出土的《归藏》中是“散”,在辑本中是“散家人”。还有《小畜》、《大畜》,在辑本里,作“小毒畜”、“大毒畜”,多了一个字。我猜想,这可能是传抄的原因。“散”就是“家人”,当时注:“散,家人。”后来抄在一块了。“毒”、“畜”通假,“小畜”就是“小毒”,当时是“大毒”、“小毒”,后来加了一个“畜”字。《恒》卦,《归藏》简作“恒我”,“我”是衍字,大概是联想来的,因为还有一处出现,就是“恒娥”,“恒”就是“常”,“恒我”就是“嫦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讲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错字。比如,《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余”,这是一个假借字。王家台简

写作“介”，这个比较奇怪，辑本作“分”。这是由“余”错为“介”，“介”又错为“分”。又比如《睽》卦，王家台简作“瞿”，辑本作“瞿”。古文字里“睽”写作“瞿”，由此错为“瞿”，由“瞿”错为“瞿”。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不过从这些推想，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很有用处。《周易》的《中孚》卦，简文作“中绝”。实际上，“孚”的古文和“绝”字所从的“色”非常相似，以致讹误。

简本《归藏》有 700 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 575—前 532）、一个是晋平公（前 557—前 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

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确乎有“三易”。可是《连山》、《归藏》大概都已佚失了。究竟是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发现了《归藏》，但这种《归藏》仅系占卜之书，而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汉志》未收它。它是比较晚出的，在易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马王堆帛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我们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占卜的材料虽然和研究《周易》的本子有关系，但和易学没有多少关系，必须区分开来。

（本文系李学勤先生 2004 年 10 月 21 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由宋立林、崔冠华、李燕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杨春梅

##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the Study of Zhou Yi

Li Xue-qi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stitute,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a. It is the most philosophical sutra that we can see today. Using the related material in unearthed literature, we can find ou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of the time, thi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unearthed artifacts; The Book of Changes; Confucius